

历史·理论·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三重逻辑

李佳怡, 负佳可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凝结。就历史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奠基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完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滋养,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思想的承续。就实践逻辑而言,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应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发展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五位一体”;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D64;X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4.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4-0009-06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中国式现代化当中蕴含的生态观,一方面凸显了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格外重视,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着别具一格的理解与创新性的实践做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张云飞^[2]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由一系列逻辑命题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目前学界对这一逻辑命题的关注

还略显薄弱。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实践提供学理性支撑。

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形成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奠基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曾言,频繁的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

收稿日期:2024-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4&ZD009);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710004)

作者简介:李佳怡(1990—),女,湖南省衡阳市人,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负佳可(1998—),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是成为世界历史”^[3]。世界历史的形成,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广泛提升与人类的普遍交往,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为人的全面发展筑牢根基。自18世纪英国率先掀起工业革命浪潮以来,科技的广泛融入与工业经济体量的不断膨胀,显著提升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塑造能力,人类干预自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4]人口的过度膨胀、放牧的无节制、乱砍滥伐、盲目垦荒和不合理灌溉等因素,致使植被急剧减少、洪水肆虐、河渠阻塞、气候失衡,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最终引发文明的式微或中心的转移。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警示着我们深刻反思与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其关乎全人类的生存根基与长远发展之路。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自20世纪20年代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32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以制度形式规范生态实践,将林木保护与根据地生产建设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制约,受限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与工业化程度,生态问题尚未凸显。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引发的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等问题,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开启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运动。1973年,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首份系统性环境治理文件。1974年,国务院又进一步设立环境保护领导小

组,颁布了《环境保护规划要点》《关于编制环境保护长远规划的通知》等文件,旨在加大全国性的环境保护力度,恢复生态环境。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完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难题,我国以法治手段构建生态治理框架。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首次以基本法律形式确立“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计划”“谁污染谁治理”等原则,填补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空白。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将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立法形式推动全民参与生态建设。1982年,邓小平在参加北京十三陵义务植树劳动时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5][21]}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基本国策,标志着生态治理上升为国家核心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为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江泽民推动完善生态立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首次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刑事立法严惩乱砍滥伐、非法排污等行为,强化了生态治理的法律威慑力。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的严峻形势,胡锦涛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6]社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更是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首次明确下来。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17]},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要求标准日渐提高,生态作为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2013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8],将生态产品定义为民生福祉的核心构成。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7]50},部署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大任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全面节约资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高度。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滋养,以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思想为承续,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全新范式,旨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根基。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同样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9]自然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更是人类生命活动展开的原初场域——自然界所提供的资源禀赋与环境条件,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基础性前提。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0]161}。换言之,自然界是人类为了维系生存而不可或缺的存在,为人类提供维持生命与生产活动所需的

各类资源与外部环境。其次,人类无论是在肉体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均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0]209}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1]。但自然规律具有客观性,是无法取消或改变的,所以人的生产生活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能忽视客观规律而任意发挥主观能动性。再次,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必然性。”^[12]人类通过劳动将自身力量作用于自然,同时又从自然中获取能量以滋养自身发展。未经人类劳动触及的“自在自然”(天然自然),唯有通过社会性劳动的介入,才能转化为“人化自然”,即被人类认知、改造并赋予其社会属性的自然存在。因此,唯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3]“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智慧,先贤秉持“万物同源、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将其作为传统生态观的核心理念之一,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在本源上的统一性,阐明合乎自然的存在状态。战国时期荀子在《天论》中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论断,奠定了“道法自然”思想的唯物论根基。四季更迭、寒暑交替、星移斗转等自然现象,皆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命题,则进一步建构起“道法自然”的实践论体系。这里的“自然”并非狭义的自然界,而是指宇宙万物本然的存在状态与运行机制。老子倡导的“自然无为”,绝非消极遁世的不作为,而是强调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姿态,顺应生命本真的生长规律。从荀子对自然规律客观性的揭示,到老子对生命本然状态的守护,再到当代中国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探索,皆贯穿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正是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不仅形成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认知,更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思想的承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态思想。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4],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思考与深刻反思,强调“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5]312}。他明确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必须协调推进,要求在积极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中兼顾生态承载力。这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随后,江泽民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需要提出了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同时,提出了关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15]的生态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6]。“生态良好”首次被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为“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七大对“建设生态文明”进行了系统阐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7]的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进一步得到提升,达到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答,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明确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民生福祉,强调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秉持严格的制度与法治,倡导全民行动,以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党中央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协同发力,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规划与部署。从毛泽东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思想的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持续发展而形成的。

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所独有的一系列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的关

键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发显著,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让经济维持持续且稳定的增长态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进而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正视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这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它们不但对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构成了威胁,还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需要推动绿色发展,即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源等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要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着手。

其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8]279}的重要理念,彰显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兼顾环境保护、确保生态安全的决心,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才能精准规划并不断精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蓝图与政策框架,使之既契合国家长远规划的宏观愿景,又回应民众对优美生态的深切向往。这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更要成为生态文明实践的忠实履行者与示范先行者,通过具体行动引领社会潮流,汇聚起共创美丽中国的磅礴力量。进一步而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意味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环节党都要发挥提纲挈领、统筹协调的核心作用,确保各项环保政策不仅设计得科学严谨,而且执行有力,成效显著。这要求党要引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方力量形成共识,协同作战,共同应对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需求,让生态

文明建设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实践。

其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在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之路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土实际,走出一条既顺应全球生态文明潮流又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意味着我们不应简单复制外国模式,而应融合中国的地理特征、经济发展状况和传统文化,量身定制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蓝图。首先,我们应不断完善相关法规与政策框架,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石。其次,我们应通过制度上的创新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其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宏大的进程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应把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所期盼的福祉当作最为关键的考量因素,要保证每一位公民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里都能够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彰显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尊重,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宏大目标必不可少的要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更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参与者。党和政府应构建起一套切实可行的机制,确保在制定、施行和评估生态文明政策的时候,能够大范围地收集并吸收民众的意见。同时,也应激励公众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让他们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踊跃的推动者。

其四,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素,该理念强调了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重要性,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其中,协调发展与绿色发展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协调发展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同步推进;绿色发展则侧重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

合,推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投资的全面铺开,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高度协同,共筑美丽中国愿景。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推进绿色产业发展,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加速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使其成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同时,应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深化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引导全社会树立尊重自然、珍爱生态的价值观,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其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8]⁶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其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多样且复杂,部分区域因生态环境脆弱而经济发展滞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应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升级、结构调整等方式不断解决生态问题,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能够相互促进。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应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生产效率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通过清洁能源革命、循环经济的发展与节能技术的创新等手段来实现技术升级,不断解放生产力,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技术升级不仅是保障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固防线,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我们应通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循环经济等发展模式,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性。这不仅有助于各行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优化经济结构,而且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9]这一重要论

断,深刻阐明了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展现出了鲜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它不仅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一次深刻反思与积极探索。这一生态观的提出与实践,无疑将推动我国朝着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稳步前进,也将对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光明日报, 2023-02-08(01).
- [2] 张云飞. 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生态观的内涵和贡献[J]. 东南学术, 2024(1): 15-23.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8.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98.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072.
-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下转第23页)

展与超越[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2): 47-55.

[5] 王怀超,张瑞.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J]. 学术探索,2021(4):17-22.

[6] 唐爱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叙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9(2): 23-32.

[7] 于安龙.“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 求实,2024(1):4-15,109.

[8] 韩喜平.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N]. 吉林日报,2021-08-09(05).

[9] 卢江.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J]. 社会科学辑刊,2023(1):115-121.

[10]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16-417.

[13] 朱宗友,李元旭,周虎,等. 中国道路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45.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宁宇涵.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意蕴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4):15-23.

(上接第14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43.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9.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71.

[16]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5.

[17]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

[18]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1).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李佳怡,负佳可. 历史·理论·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三重逻辑[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4):9-14,23.